

宿管员“吴阿姨”走红记

文/片 本报记者 崔岩

6月20日那天,吴光华做梦也没有想到,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当了10年宿舍管理员的她,竟然有机会站在盛大的毕业典礼的发言台上。

5分26秒的演讲,赢得11次雷鸣般的掌声,平均30秒就会被打断一次。现场学生打出横幅,高呼“吴阿姨,我们爱您”,她的风头抢过了旁边的校长。

视频在网上被疯传,“吴阿姨”火了。

这位“吴阿姨”是何许人也?她就是南信大一名普普通通的宿舍管理员,原名吴光华。

事实证明,选她是 对的

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位于南京浦口区盘城,距离主城区比较远,从目前网上热炒的程度来看,这所大学是跟着它的宿舍管理员“吴阿姨”出了名。

对于“吴阿姨”的不断升温,南信大校长李廉水说他也“万万没有想到”。

6月20日,南信大举行毕业典礼。在此之前,李廉水曾应邀参加美国底特律大学毕业典礼,他觉得,中国的大学一样可以走西方的“温情”路线。

挑选毕业典礼演讲人时,南信大党委宣传部部长金自康遵循的原则,就是挑选学生最喜欢的。“发自内心的东西才能感人,感人才能打动人,打动人才能进而影响人。”

吴光华,也就是这个时候进入了他的视线。

在网上西祠胡同“南气风云”里,吴光华一直人气很高,帮学生收被子、缝衣服、热牛奶,她的事迹经常被晒在网络上,学生们亲昵地称她为集保姆、保洁、保安于一身的“吉祥三宝”。

“好几个学生和老师向我推荐她。”一个普通的宿管员能有如此大魅力?金自康决定亲自去看看。

站在宿舍楼前十几分钟,金自康有些吃惊地发现,过往每个学生都会主动跟吴光华打招呼,说一声

“阿姨,您好”。

仔细交流,金自康发现,60岁的吴光华与同龄人相比,“潮”得很。

在岗十年,男生宿舍里,她是第一个把祖玛游戏玩通关的人,拥有9位数“5”字头QQ号,迷恋韩剧,她还会大半夜爬起来上网挨个偷学生的“菜”,难怪学生乐于与她分享“心里话”。

“阿姨,你没事吧?”交谈中,一名男生突然冲进来,用充满敌意的目光盯着金自康等陌生人,原来,男生以为他们在“欺负”吴光华。

这个男生无意的举动,让金自康选定了吴光华。这,足以看出学生对吴光华的关心。

后来,金自康才知道,那个冲上来的男生叫张自在,也就是后来给吴光华制作横幅的带头人。

事实证明,选定“吴阿姨”是对的。

没什么能轻易打 动人,除了真实

一场毕业典礼,吴光华突然出名了,这是她做梦都想不到的。

在频频闪烁的镁光灯下,吴光华有点“吓坏了”。

6月23日,吴光华关闭手机,拔掉国话,QQ下线,请校方帮其谢绝媒体采访,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。

“我就是个普通人,没想过出名,我不想改变以前的生活。”在记者费尽周折终于见到她后,吴光华

说。

玫红的上衣,染黄的头发,吴光华显得很年轻,并不像60岁的样子。只是,她的面容有些憔悴。

“学生都走了,相处久了,舍不得。”一说这个,吴光华的眼圈就红了。

“哪个学生走,她都哭,心情一直不好。”旁边的学校宣传部人员告诉记者,29号宿舍楼里90名毕业生,每一人离校,都是吴光华亲自送走的。

“不要老吃这些,要按时好好吃饭。”29号宿舍楼内,已是下午1点半了,看到有学生抱着方便面进来,吴阿姨“佯装”生气批评对方。

“外面雨大,怎么不拿伞?”宿舍门口,看见有名男生想往雨里冲,吴阿姨赶紧喊住他,一边“教训”,一边把自己的伞给了他。

如果不是亲眼所见,很难相信,半个多小时,过往学生全都给吴光华主动打招呼。

29号宿舍有900多名学生,她都能记得住?记者随手指了一名进来的男生,想考考吴光华,“数理学院03(班),王泽(音)。”没有任何犹豫,她脱口而出。

这就是吴光华,看到有学生老不洗衣服,老不收拾房间,她忍不住要说;有学生挂了科,失恋没精神,她就要骂;学生经常打游戏,上网夜不归宿,睡懒觉“逃课”,她更会忍不住唠叨。

“那天我在毕业典礼上就是说说了心里话,我也没想到会引起那



▲“吴阿姨”接学生电话时,一脸幸福。

么大的反应。”吴光华觉得,没有什么可以轻易把人打动,除了真实。

最后一堂课,效果 奇佳

2010年,大学毕业典礼上最轰动的人,非华中科技大学校长“根叔”莫属。当年,华中科技大学录取分数线大涨。

虽然“根叔”的演讲,与2010年该校录取未必有直接关联,但是华中科技大学因“根叔”声名大噪,却是事实。

南信大也一样,“吴阿姨”之前,想必很多人并不知道,在中国数以千计的民办公办高校中,还有一所南信大。

毕业、招生,正值高校一年最忙的时候,“吴阿姨”出名了,引来了中央电视台、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地媒体关注,关于“吴阿姨”的报道,均被南信大转载到了该校主页上。

意外得到这么多“免费广告”,这让学校很高兴,他们也期盼着,今年的招生可以如去年华中科技大学那般顺畅。

而“吴阿姨”演讲视频的疯狂传播,也引发了社会上诸多人对大

学育人理念的讨论。

2009年,履历平平无奇,只会写5个字的82岁宿舍服务员“三嫂”袁苏妹,被香港大学授予“荣誉院士”,并赞她“以自己的生命影响大学堂仔的生命”。

同年,英国剑桥大学授予清洁工阿伦·布莱汉姆和比尔·盖茨荣誉文学硕士。布莱汉姆在剑桥尽心,尽力扫地30年,深受师生喜爱,被誉为“用扫帚书写剑桥历史的人”。

“吴阿姨”也好,“三嫂”也罢,她们的出名多半与真实的情感有关。

网络上,有人说“不是吴阿姨出名快,而是这个社会太沉闷”。

“评断一个国家的品格,不仅要看它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民,还要看它的人民选择对什么样的人致敬,对什么样的人追怀。”美国总统肯尼迪曾说过的话,放在今日,尤显其义。

国内的毕业典礼,通常有领导致辞,教师发言,学生发言,一个来自底层的后勤服务人员,往往难登大雅之堂。

而南信大的毕业典礼给毕业生上了大学最后一课:对普通劳动者的尊重。这课堂效果奇佳。

“抢救”老红军

本报记者 廖雯颖

6月26日晚上,余静接到一个电话,她前不久采访过的94岁老红军蒲文清,因为心脏病猝发去世了。

余静最后一次见到蒲文清,是在5天前,她所在的央视摄制组将刚拍摄完成的纪录片《永远的红军》影像素材移交给解放军档案馆永久保存的发布会上。余静是这个摄制组的制片主任,蒲文清老人是出席发布会的6名受访老红军代表之一。

这是余静在半年内第三次遭遇她采访过的老红军去世了。为了拍摄《永远的红军》,这个央视军事频道的摄制组耗时15个月,在全国范围内采访了150位老红军。

“摄制组在上海采访的10位老红军现在只剩下一半了。”她说,这个群体的数量还在以看得见的速度减少。据不完全统计,去年全国健在的老红军有2000人左右,通过余静他们一年多时间的寻访,最终能接受采访的“也就一两百人”,并且“身体大都不好了”。

在受访老红军中,年龄最小的86岁,“当年参军时只有9岁”,年龄最大的105岁,“100岁以上的有17位”。这些人里,有宣传员、卫生员、机要员、司号员、译电员……因为大多数都是普通红军战士,他们过去很少被人关注。

“每年到七一,都会做类似的节目,但大多做十大元帅,开国元勋这些大人物。我们这部片子定位是小人物,小视角,采访的都是当年最普通的红军战士,讲述大历史里的小故事。”

蒲文清当年就是红四方面军医院里的一名看护。1932年,父母双亡被迫当童养媳的蒲文清逃出四川,加入红军队伍。1955年,当时在交通部工作的蒲文清响应国家机构精简号召,37岁就提前退休。退休后在北京交道口街道办事处一干就是23年。

余静一组人采访了蒲文清三次,2011年正月初七,穿着红棉袄的老人踩着皑皑积雪,带着摄影师穿行她几十年来管理过的两条胡同,和邻里们打招呼。

老人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和褐色的老人斑,可当她谈起当年参军的往事时,脸上的皱纹都“绽放出了光彩”。

三次采访,蒲文清讲的都是些小事,甚至是“一条毛巾应该怎样拧出水来”。但如果没有人提起,这些琐碎的细节也许早已消逝在时间里。

“也许他们觉得自己当年什么也没有做,也没有什么值得拿出来说的。”余静说,有一位老红军当年是司号员,她去采访时,对方想不通自己一个吹号的有啥可采访的。“其实他很有意义,勇闯大渡河时,他就在河边,大家是听着他吹的军号冲过去的。”

余静认为,并非老人们不愿意倾诉,只是现在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听这些老人讲过去的故事。时代隔得太久远,年轻一代没有了感觉——此前那些电影和教科书里的红军故事,从来都是“高大全”,看起来更像是遥远的传说。

余静提起一个湖北老红军

周忠甲,是她采访过的老红军中唯一会上网的,热爱偷菜,会聊QQ,“特别幽默”,即使战争让他左眼失明,只剩一只眼睛,也不影响老人的玩兴。

“有一回老爷子病重,感觉自己可能撑不过去了,于是在病床上告诉儿子:‘你知道吗,你老子很厉害的,以前当过战斗英雄’。”余静说。

那场战役,死伤惨烈,周忠甲表现英勇,却拒绝了颁发给他的战斗英雄奖章,他觉得如果自己接受了,死去的战友算什么?“这件事这么多年他都没提过,连最亲的人都不知道。”

《永远的红军》摄制组有规定,每位老人采访时间不能超过半个小时,“担心他们说起过去情绪太激动,影响身体。”但沉浸在往事中的老人往往半小时打不住,“最长的一位讲了三个小时。”

一位叫阳震的老红军说过的“最幸福的事”,让余静印象深刻。阳震说,当年长征时,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可以抓着马尾巴,边走边睡觉,“啥都不用想了”。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,这就是最幸福的。“老人说到这儿,脸上还露出特幸福的表情。”

阳震对于幸福的感悟让70后的余静有些难以理解,她也说不上来到底是故事里的哪些细节打动了她,但现在她再看到“红军”两个字,就觉得“特别亲切”,对于红军“坚强勇敢”品质的理解,“也不是以前那个层面了。”

“这是一批特别可爱的老人。”



▲蒲文清在接受采访。(余静提供)

该纪录片制片人翟树杰说,“红军时期特别简单淳朴,就是推翻不平的天下,让受苦人都有饭吃。这是一支特别年轻的队伍,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,走到今天不容易,历经一起起落落,他们的心态特别好。”

翟树杰说,这批十几岁参军的老红军虽然都已暮年,却并不悲观消沉,“自信乐观”、“淡定”是他们最大的共同点,“总觉得自己为国家做得太少,所以一直在做贡献。”

余静告诉记者,老红军们的待遇参差不齐,有的在部队上级别高,生活比较优越,也有当年没有走到最后的红军失散人员,后来归地方管理,生活相对艰苦一些。但是“没有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条件表示不满”。

余静采访的北京军区一位老红军杨德千,每个月的津贴一万多,但花在自己身上的钱却少得不能再少,他把钱都捐给了希望小学。

当摄制组走进杨德千老人独居的房子时,感觉很心酸,家徒四壁,唯一值钱的是一台29寸的大彩电,其他值钱的都让老人送出去

了。锅里是自家种的青菜,加一点玉米面,兑上老醋,老家在山西的杨德千吃得很香。

96岁的杨德千老人住过三次院,为了治疗严重的细胞病变,要抽骨髓治疗。杨德千说,抽吧,能治好当然好,如果治不好,他愿意当一个实验,做点最后的贡献。

“过去的人很穷,但骨头很硬,他们身上有我们缺失的精神信仰。”翟树杰说,他希望通过挖掘老红军的故事,把红军的精神留给后人。

《永远的红军》一共30集,其中一集是讲述蒲文清的故事,叫《胡同里的红军奶奶》。“可惜老人看不到了。”余静不敢想,十年后还能有多少老红军在世,迟暮的生命变化太快,逝去太容易。蒲文清的离开越发让她感到任务紧迫,这是一个与时间赛跑的“抢救”工作。

为了不应被忘却的历史,为了追寻当下的缺失,“我们必须尽快去做,一天都不能等。”余静掏出手机,又看了一遍蒲文清女儿发来的短信:“……愿我伟大的红军妈妈安息。”她喃喃念着最后一句。